

文学与现实、乌托邦、异托邦

——论中国当下小说的一种后现代状况 □李 音

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当代小说写作有三种潮流值得注意: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及非虚构写作的兴起;科幻文学备受瞩目;传统(非现代、地方的)类型文学的复兴以及传统文学手法的借鉴。它们并置共存于当代后现代文化状况中,如果(也必须)抛开现代以降文学体制中的文类等级、文体区分概念来看待这种共存,就会发现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多元性、时空压缩的内容和产物,又是其形式表征——事实和虚构的界限区分不再重要,时空纬度也趋于消弭。

20世纪中叶,马歇尔·麦克卢汉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一系列地震般的预言,电子媒介使信息瞬息万里,全球事件同步化,因而时空极大压缩,地球成为村落般的弹丸之地。新兴的电子媒介具有非线性、重复性、非连续性、直觉性、类推理性,将改变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人类的感知系统不再只偏重视觉,文字和线性结构,印刷文明的古登堡时代一去不复返。如今我们正生活在麦克卢汉所预言的世界,凭借日常经验就可以理解《理解媒介》。虽然不是所有预言都完全实现,但迄今为止我们共同认可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其赖以形成的两大条件的确正在经历迅速转型——全球化使民族国家式微,各种新媒介正在替代、挤压和改变着印刷文化的功能、传播空间以及自身样态。基于此,希利斯·米勒在本世纪初宣告:“文学就要终结了”。但他强调,“终结”的只是作为西方文化机制的文学,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些文学形式,文学——作为对文字或其他符号的一种特殊用法,在一切时代任一人类文化中都以不同方式存在着,并且经得住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是永恒的。



的确,就现代文学的主流体裁“小说”而言,某些写作观念和手法可能衰落了,但并不意味着小说就要消亡了,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还意味着观念的解

放。一段低迷危机时期后,取而代之的是更开放的文学实验和多元的写作。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当代小说写作有三种潮流值得注意:现实主义文学的回归及非虚构写作的兴起;科幻文学备受瞩目;传统(非现代、地方的)类型文学的复兴以及传统文学手法的借鉴。它们并置共存于当代后现代文化状况中,如果(也必须)抛开现代以降文学体制中的文类等级、文体区分概念来看待这种共存,就会发现它们既是麦克卢汉所描绘的我们这个时代文化多元性、时空压缩的内容和产物,又是其形式表征——事实和虚构的界限区分不再重要,时空纬度也趋于消弭。按麦克卢汉所说,电子时代惊人的技术发展使我们后现代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返石器时代、重新部落化,那么技术的发展更使人类感觉“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几乎迫在眉睫。“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现实、未来(乌托邦)和过去(抑或异托邦)正并置不停地共同构造着我们的时代感知和想象,上述三种文学潮流程度不同地在这个意义上合力书写着我们的“现实感”。

人类从未有一个时代像20世纪后半叶以来这样,一切事物都具有惊人的短暂性和流变性,但那些基于政治经济原因的苦难、公正、自由等社会问题仍旧顽固地拒绝烟消云散。因此在经历了1980、1990年代的一系列形式实验和各种风潮后,中国当代小说和许多先锋作家明显向现实主义回归,我们仍然对文学抱有道德期望,不仅渴望得到事实和真相,有关世界的图景,更期望在难以捉摸和理解的时代寻找意义和导向。但这一点却比以往的现实主义写作更难做到。信息时代瞬息万变,每日各种社会事件、消息和无穷无尽的图像通过新媒介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人们,不仅挑战着文学书写的速度和反映能力,更远远超越了文学的想象力和作家的才能。在过去的时代,作家成功地担负了描述社会整体、同情私人困扰和聚焦公共议题的任务,现在则时时面临着和公众一起陷入茫然和困扰的窘境,当下现实主义小说,虽然涌现一些出色的作家作品,但整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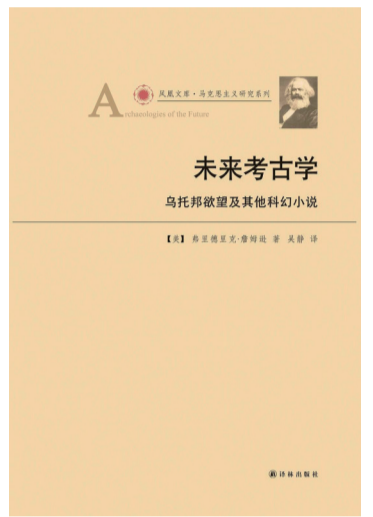
来说,一方面广泛地展示了现实问题与社会危机,另一方面作家所写并没有超出公众所知。正如有批评家所观察到的,这一轮现实主义写作感叹大于分析与批判,对问题的发现难免因批判能力的匮乏而消解。社会学家米尔斯曾经的呼吁如今越发显得具有警醒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必须成为人文学者重视的心智能力,严肃的艺术家可以由于社会学的想象力而变得生机勃勃,也将从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帮助。因为,我们的时代,称之为景观社会也好、后现代或数字媒介社会也好,都意味着不再能一目了然地得以理解。小说家现在必须与以敏锐的描写手法写成的社会科学著作进行竞争,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当然这也是比较高的要求。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率先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则试图通过这种超越既有文学形式与分类的写作,以更直接的方式进入世界,重建文学与世界的关系。非虚构写作试图克服我们个人经验的碎片化和间接性——充斥于我们日常生活的信息大多来自于媒介。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非虚构的确是一种更适宜的叙述形式,因为相比对事实的理解,非虚构的价值和特点更在于对世界的介入和亲身体验性。不过,非虚构也好,现实主义小说也好,最优秀的作品都具有将经验主题化的特征,并且显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有益于我们对世界及其困境的理解,否则这些叙述便只是又为世界生产了一些信息,添加了一些景观而已。

随着刘慈欣小说《三体》的畅销和获奖,科幻文学在中国也开始摆脱次级文类的身份而备受瞩目。在人类科技发展据说已接近“奇点”,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成为人类最关心的话题的情境下,科幻文学对未来世界的物质精神文化生活和科学技术远景的想象和预见越来越显示出强烈的世界性和当代性。科幻文学往往是从人类文明整体,而不是种族或国家出发来思考问题、响应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文学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学。另外,科幻小说以迂回的方式拷问我们现世的问题,从未来、从飞地重新折回到我们对现实的批判和思考。如詹姆逊

在《未来考古学》中所反复强调的,我们必须把科幻小说和未来历史的关系从一种陈旧描述中颠倒过来。作为一种叙事的方式和知识的形式,它并不能使未来具有生命力,哪怕是在想象中。相反,我们应该将科幻文学视为一种中介载体,它反映着我们时代对他性和极端差异性(乌托邦)的想象力和边界。科幻文学指向未知的东西,但我们对未知事物的描述却无可救药地陷入我们当下熟悉的事物的泥潭,那么对未来的想象就会出人意料地铭刻上我们的当下性,从而变成了对我们绝对极限的思考。科幻小说是把未来当作当下,把当下视为历史来理解的,也就是说,对未来的描述就是我



播并让我们担忧我们关于同与异的上千年的做法”。也就是说,这种异质混杂经验的冲击,甚至质疑了我们时代思想和知识分类的秩序及其不证自明性,移植解开了我们的神话和话语。相对于于虚乌有的乌托邦,福柯所描述的“另一个空间”——异托邦,可以在异质混杂性的意义和特征上来理解。这是超出我们思想限度的,具有异乎寻常魅力的东西。相对于整齐、理性的现代文明,各个种族的文化都带有异托邦性质和特征,这些曾经被压抑的异质文化(前现代的、地方的)不同程度地在后现代语境中得到了复兴,或获得了新的关照态度。过去被现代文学划归在通俗文学、旧文学名下的类



们现在的宏大叙事。像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之所以引发热议,其想象和局限都深深地印证着我们对未来想象的当下性。

既相关又相对立于“乌托邦”,福柯提出过一个“异托邦”的概念,其灵感源于阅读博尔赫斯一段有关“中国百科全书”的描写。这段百科全书内容的奇怪和不恰当,其异质混杂性,不仅给人带来欢笑,还让人迷失方向,“这种笑声动摇了我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所有熟悉的东西,这种思想带有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地理的特征。这种笑声动摇了我们习惯于用来控制种种事物的所有秩序井然的平面和所有的平面,并且将长时间地动

型文学,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改头换面在网络文学中找到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这是五花八门的网络文学借着新的生产方式常常被人忽视的一个特质。同时,严肃文学创作目前也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学的文体和手法有了新的理解,对其不同方面的借鉴目前正成为小说创新的重要途径,这方面的例子已不鲜见。但像福柯所说的,“异托邦是真实存在的,但它的存在,要借助于人的想象力”。希利斯·米勒说的对,文学仍旧是我们的世俗魔法。那些言语不仅发挥着记叙作用,也有施行功能,不仅发现真相,更为我们发明世界。(作者单位: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改革开放40年贵州小说关键词

□颜水生

贵州作家既描写了历史发展的波澜壮阔和宏大气势,也讲述了历史过程的荒诞与悲剧;他们既有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描绘,又有对个体人生命运的讲述;贵州作家应该在历史进程中透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生命运的本质和世界存在的真谛,小说的历史哲学应该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追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贵州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小说家,比如何士光、叶辛、伍略、龙志毅、余未人、李宽定、赵剑平、石定、苏晓星、戴绍康、谭良洲等,《乡场上》《蹉跎岁月》《孽债》《麻栗沟》《绿色的箭囊》《遮荫树》《娘伴》《省城轶事》《女儿家》等小说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进入新世纪以来,贵州涌现了一批较有实力的中青年小说家,欧阳黔森、冉正万、肖江虹、王华、谢挺、戴冰、肖勤、唐玉林、杨打铁、龙潜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从蹇先艾到何士光,贵州作家长期扎根于乡土叙事,并取得了重要成就。新世纪贵州小说创作继承了中国乡土叙事传统,在人性、历史、文化与形式等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并张扬了探索精神、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成为新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一股重要力量。蹇先艾和何士光等作家奠定了贵州作家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优秀传统,《断河》《敲狗》《树上的眼睛》等作品延续了这种传统,而《摊面》《百鸟朝凤》《村长唐三草》《暖》等中篇小说可以说异军突起,显示了贵州作家在中篇小说创作方面良好的发展趋势,《非爱时间》《绝地逢生》《桥溪庄》《花河》《花村》《银鱼来》《天眼》《困豹》等作品代表了贵州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的重要成就,长篇小说的崛起显示了贵州作家在新世纪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进展。总体而言,人性、历史、文化、形式是改革开放40年来贵州小说最为重要的内容,也是贵州小说研究不可绕过的关键词。

描写人性美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近40年贵州小说的重要内容。何士光无疑是20世纪末期贵州小说的一面旗帜,他的《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远行》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何士光深刻理解农民的生活和性格,善于描写农村变革中农民的心理变化,揭示了时代变革中农村的矛盾与苦难,何士光的小说带有浓厚的时代印痕。在《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远行》中,何士光以小见大,深入挖掘农民的美好人性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人性美、人情美与自然美、时代美形成了统一。叶辛《蹉跎岁月》描写了知青一代的汗水和

眼泪、艰辛和痛苦、理想和追求,描写了知青一代在青春年华中的岁月蹉跎,表现了知青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蹉跎岁月》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畅销书之一,“蹉跎岁月”也成为知青的代名词。叶辛《孽债》描写知青返城后的生活和感情经历,被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叶辛习惯把知青经历处理成悲剧,不同于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等知青作家的“青春无悔”叙事模式,但他们都突出了对人性的揭示以及对理想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蹉跎岁月》《孽债》都被北京大学的洪子诚写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洪子诚把叶辛看作是知青小说的代表性作家之一。洪子诚的文学史著作是最有影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之一,这也说明了叶辛在小说创作方面的影响。何士光和叶辛使贵州小说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坛占据一席之地。美好人性一直是欧阳黔森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在生活困难的革命时代,人们最终都得回归到日常的物质生活和人际关系,人性美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人性、温暖时代,他的《敲狗》《扬起你的笑脸》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何士光认为《敲狗》“对人性作了一次深深的审视”。肖江虹《摊面》《百鸟朝凤》也都体现了对人性善良的向往。肖勤《暖》集中表达了对人性美好和人间温情的追求。贵州小说也表现了对人性恶的反思与批判,欧阳黔森《水晶山谷》、赵剑平《困豹》、王华《花村》、肖江虹《当大事》等小说均揭示了人性的异化与丑恶。

贵州作家的长篇小说显示了描写短时段历史内容的创作追求,比如欧阳黔森的《非爱时间》和《绝地逢生》表现了近30年的时代变迁,不仅有对现实的深刻关怀,更有对历史发展的透彻理解。长篇历史小说《雄关漫道》详细讲述了红二、六军团转战贵州并且在黔东和黔大毕地区开创革命根据地的经历,塑造了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乌蒙山区和乌江独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为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造了条件,贵州良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气氛为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机会。冉正万《银鱼

来》叙述了从民国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百年历史,主要以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为背景讲述了范、孙两家人的命运兴衰,《天眼》讲述了特定历史时代的真实故事,通过故事打通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王华《花河》叙述了从民国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近百年历史,主要以土地改革为背景讲述了地主王虫及妻妾们的命运兴衰。贵州作家既描写了历史发展的波澜壮阔和宏大气势,也讲述了历史过程的荒诞与悲剧;他们既有对民族国家历史的描绘,又有对个体人生命运的讲述;贵州作家应该在历史进程中透视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生命运的本质和世界存在的真谛,小说的历史哲学应该成为他们创作的重要追求。

贵州小说表现了地方文化的独特性。欧阳黔森、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代表了贵州小说在文化表现方面的重要成就。红色文化是贵州文化的重要内涵,欧阳黔森描绘了贵州浓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坚守了社会主义伦理。欧阳黔森一方面通过人民伦理和地理表现了对文化传统和革命历史的思考,表达了对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歌颂,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原则,另一方面,描绘了改革时代的巨大变化,表现了对时代精神和自然宇宙的思考,强调了社会伦理和自然天理在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价值,尤其是他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体现了社会主义伦理在新时代文学创作中不断开拓与创造的可能性。社会主义伦理是20世纪以来中国的宝贵财富,由革命到改革的话语转换表明社会主义伦理必然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社会主义伦理也是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欧阳黔森在文学创作中对社会主义伦理的坚守与弘扬,为新时代讲述中国的方法提供了重要启示。贵州处于边远山区,山高路远,贵州文化是典型的山地文化,尤其是巫文化成为贵州小说发展的深厚源泉,冉正万《银鱼来》、王华《摊面》和肖江虹《瘟镇》等小说是表现巫文化的代表性作品。《银鱼来》描写四牙坝、银鱼和蟒蛇时,都表现了鲜

明的巫文化色彩,四牙坝位于黔北群山丛中,范孙两家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而隐居于此,建构了独特的巫文化传统,一年一度的拉银鱼活动是四牙坝村民收获的节日,每年到了这个时节,四牙坝人的生活需要,也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瘟镇》中的巫文化在瘟镇代代相传,一直都是瘟镇村民的精神寄托。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把这些文化活都当作狂欢节进行描绘,这种狂欢活动给村民带来短暂的快乐和生命的激情,让他们可以暂时忘却生活的艰难。众所周知,现代性发展是伴随着巨大破坏力量的增长而出现的,现代性不仅无情地摧毁前现代世界,而且把自身也推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巫文化可以说是前现代世界的重要代表,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倾力表现贵州丰富的巫文化资源,复现了前现代世界的魅力,尤其表现了村民在巫文化中保存下来的生命激情与活力,然而,现代性的发展又使巫文化陷入了严峻的生存困境。新世纪贵州小说表现了文化传承的困境,肖江虹《百鸟朝凤》中的唢呐在无双镇具有悠久的历史,像身体里的血液一样,吹唢呐在无双镇各种活动中都不可缺少,唢呐匠在村民中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人。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唢呐匠前仆后继地奔向城市,吹唢呐的人越来越少,游家班解散了,甚至于唢呐在无双镇陷入了即将失传的困境。王华在《摊面》中认为美丽的传说既留下美丽的节日,又遗传下一个严酷的现实,巫文化的无穷魅力仍然无法挽回它的消逝命运,这也成为现代性的内在悖论。肖江虹、冉正万和王华身处现代生活的大漩涡中,痛心于前现代乐园的消失,他们指责现代性的破坏力量,却对巫文化缺乏必要的反思,表现出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文化描绘与思考不仅发掘了贵州小说的深度,而且拓展了贵州小说的广度,也呈现了贵州小说的限度。

贵州小说在文体实验和形式创新方面也作出了重要探索。小说文体对人生与世界的描写在理论上有其广度和深度的无限可能性,欧阳黔森借

鉴诗词、散文、音乐、传奇等进行小说的文体实验和形式创新,通过小说的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音乐化、小说传奇化,表现了小说文体具有包含小说以外各种文体的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角度来看,欧阳黔森在小说方面的跨艺术探索或跨文体写作既是一种审美化策略,更是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小说散文化还是小说音乐化,其实都是心灵、情感的再现;尤其是在小说的诗化和传奇化中,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都被融合成形式的“意识形态”。风景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在何士光的小说《种苞谷的老人》中,开篇那几段风景描写具有浓郁的诗意,是一个典型的诗意化意境。何士光描绘了一个富有美感的意境,在一个遥远寂静的村庄,四面青山屏障,山谷幽深、石径通幽、溪水潺潺。这种诗意的意境不仅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而且对表现小说主人公刘三老汉的心灵世界和生活追求都有重要作用。肖江虹在《摊面》中关于雾的描写也是一种极具象征意味的风景,欧阳黔森从感觉出发,描写了神奇的风光、牧歌体风景、荒原体风景和灵性的风景,表达了他的民族国家立场、反思现代性意识、乌托邦的社会理想和对生命的尊崇以及对自然的热爱。欧阳黔森通过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风光描写,不仅批判了人性的贪婪与丑恶,而且在审美或想象层面上对现代人发展中的矛盾与问题进行了反思,这就是说,贵州作家在风景描写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象征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小说创作方法。在冉正万《银鱼来》《天眼》等一系列小说中,既可以看到传统现实主义的创作技法,又可以看到魔幻、荒诞、反讽等现代主义小说的形式技巧。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真谛是探索世界的复杂性,与京沪苏鲁等省份小说比较而言,贵州作家在内容的复杂性方面有待提升,在形式的复杂性方面更需要大胆探索和创新。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编号:17SSD011成果)

